

韩国语教材的中华文化呈现研究*

——以《新经典韩国语》为例

刘 静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 上海 200083)

摘要: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新经典韩国语》教材的中华文化呈现特征进行考察。研究发现该教材呈现了丰富多元的中华文化主题;中华文化的呈现维度以文化产品和文化实践为主,也有文化观念、文化社群和文化人物;教材整体重视文化语篇呈现和文化活动/练习,文化表达练习多于文化理解练习;教材多采用中韩文化共现的呈现视角。基于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文化要素平衡—显性路径优化—跨文化视角融入”的教材建设优化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外语教材建设提供启示。

关键词:韩国语教材;文化呈现;中华文化;新经典韩国语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25)03-0029-06

DOI:10.13978/j.cnki.wyyj.2025.03.011

0. 引言

外语教材并非简单的知识学习工具,更是传递文化价值观的重要载体,是受国家意志影响的文化产品(Apple & Christain-Smith 1991; Gray 2010)。外语教材如何选择和呈现不同文化及由此反映出的外语教学理念、目标和方法的发展变化,一直是外语教材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Risager & Chapelle 2013)。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培养新时代国际化人才需求的时代背景下,分析外语教材中华文化的呈现和融入成为研究热点。外语教材如何平衡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关系,夯实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与价值观根基,培育具备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新时代人才,已成为当前外语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韩在经贸及其他领域合作日益紧密(贺莉娜,任承炫 2022),中国对韩国语教学的需求持续旺盛。当前,韩国语作为第一或第二外语的教学主要在高校展开。截至 2020 年,我国朝鲜(韩国)语本科专业点已达 133 个,韩国语教材出版数量在各类非通用语种专业教材中位居第一(苏莹莹,董希骁 2021),但韩国语教材研究甚少,明显滞后于韩国语在我国的发展态势。鉴于此,本研究以国内高校广泛采用的韩国语精读教材《新经典韩国语》(1—4 册)(以下简称《新经典》)为例,对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呈现进行分析,以期对未来韩国语教材的编写提

出可行性建议,助力新时代外语教材编写、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

1. 文献回顾

1.1 外语教材的中华文化呈现研究

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是推动世界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的重要路径,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显著标识(林晓华,林睿 2024)。自“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从丛 2000)提出以来,外语教材中的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热点。早期研究多聚焦于文化内容的国别属性,重点讨论“谁的文化”,而对于“什么文化”的关注相对较少(张军,刘艳红 2022)。随着研究深入,学界开始关注中华文化在外语教材中的内容构成与呈现方式。张虹和于睿(2020)把中华文化分为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现代文化,指出一些英语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内容主要涵盖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且多以隐性方式呈现。肖维青(2024)对大学英语教材中的“中国故事”从时间维度、呈现深度、语言质量、故事性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文化的呈现占比平均达到 16.9%且以现代中国故事为主。李加军(2023)发现基于跨文化理念编写的英语教材较为注重本土文化的融入,指出这种文化选择逻辑受教材编写者的跨文化研究者身份影响显著。迟若冰等(2024)的研究与其形成互证:西方跨文化交际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包罗万象,涵盖文化产品、实践、观念、个体与社群以及地域等五大类别,教材中约 70%的中华文化意群与其

* 本文为上海市教育科学基金项目“文化自信视域下高校外语类专业教学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的路径研究——以线上线下混合式朝鲜语阅读课为例”(编号:C2021296)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教材研究院研究项目“韩国语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呈现研究”(编号:2022SH0014)的阶段性成果。

他国家/民族文化一起出现,并且相互间存在对比、类比或杂糅的逻辑关系。

方法论层面,张虹和李晓楠(2022a)开发出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并将其拓展应用于英语、德语、法语等多个语种教材的文化研究(张虹,李晓楠 2022b;葛囡囡 2022;谈佳,张璐 2022;张虹等 2024)。尽管这些研究深化了对文化主题与呈现关系的理解,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过度聚焦中外文化横向比较,忽视对中华文化本体主题层级的纵深探讨;另一方面,缺乏系统性内容配置分析,难以构建契合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价值传递体系。

1.2 韩国语教材的文化呈现研究

韩国学界对对外韩国语教材中的文化项目及其教学体系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Kang(2011)对多套对外韩国语教材中的文化项目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现代文化与行为文化在教材中占比最高,其中又以日常文化为主,并基于此提出了适用于韩国语教材的文化框架模型。Jang(2017)与 Ryu(2017)针对韩国语教材中文化的单一性问题展开探讨,强调融入多元文化的重要性,以期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些研究围绕对外韩国语教材展开,核心目标在于传播韩国文化与价值观,促进文化的跨国理解与交流。

相较而言,国内韩国语教材的相关研究多聚焦于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层面(卢星华 2017;李海英 2021),涉及文化内容的研究较为匮乏且以分析外版教材为主(孙丽萍,苏晓霞 2020)。这一现象与非通用语专业普遍采用外版教材的现状密切相关(苏莹莹,董希骁 2021)。国内自编教材的文化研究尤显不足。在知网数据库以“韩国语教材”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仅发现 1 篇相关研究文献。该研究仅对教材中的部分文化板块进行了分析,未涉及中华文化呈现的系统考察(于美灵 2022)。

综上,当前韩国语教材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研究重心偏向外版教材,对国内自编教材的关注明显不足;二是从文化视角审视国内自编教材的研究较少,为数不多的文化研究大多局限于中外文化内容的占比分析,未能深入探讨中华文化的结构与呈现方式;三是主观论述多于实证研究,难以全面且真实地反映我国韩国语教材的文化呈现特征。鉴于此,本研究将以国内自编教材《新经典》(1—4 册)为例,开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深入探讨韩国语教材中文化呈现的特征与规律,旨在为完善韩国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设计提供

理论支持。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呈现即展示,包括语言呈现和非语言呈现(例如图片、人物国籍、对话场景等)。本研究中的“中华文化呈现”在教材中具体表现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阅读或听力语篇(文章或对话)、语段(如一段描述旗袍的句群)、句子、词汇(如地名、节日名称)以及图片等。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新经典》呈现了哪些中华文化;(2)中华文化如何在《新经典》中呈现。

2.2 教材选取

本研究选取韩国语系列教材《新经典》(1—4 册)作为研究对象。这套教材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2018 年版)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非通用语种类专业教学指南》(2020 年版)相关理念编写,2020—2022 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陆续出版,是目前国内高校朝鲜(韩国)语专业基础朝鲜(韩国)语课广泛使用的一套教材。

2.3 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杨冬玲和汪东萍(2022)所提出的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层级分析框架为理论基础。该框架由 3 个层级构成。第 1 层级为文化“类型”,主要依据 Cortazzi & Jin(1999)的研究,以目标语言文化与外语学习者母语所在国家文化为分类标准。这种分类方式体现了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结构关系,属于基于文化内容本体之外的外部分类标准。第 2 层级和第 3 层级分别是文化维度和文化主题,这两个层级基于文化内容本体的内部特征进行划分,为深入剖析外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提供了精细化的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结合教材实际特点,本研究构建了四层级分析框架,从中华文化的主题、呈现维度、呈现路径和呈现视角 4 个层面展开深入分析。其中,文化主题是最基础、最微观的文化层面,也是文化内容最直观、具体且易于理解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在基础阶段的语言类教材中,教材内容通常以主题单元的形式进行编排,并通过各类教学活动呈现相关文化。因此,研究的第一步便是系统考察教材中所呈现的文化主题。

文化的呈现维度位于中观层面,是对文化内容的分类和概括,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本研究采用 Moran(2004)提出的文化五维框架,具体包括:

(1)文化产品(人工制品、场所、组织和艺术形式);(2)文化实践(恰当的文化行为);(3)文化观念(信念、价值观、态度和观念);(4)文化社群(与他人产生关系的方式,包括人际关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5)人物(存在于某文化中的个体成员)。在实际分析中,同一主题可能具有不同的呈现维度。例如,以“饮食”为主题时,若介绍地方菜品的特色(如川菜、粤菜等),则归属于文化产品;若谈论不同季节人们的饮食习惯,则属于文化实践;若探讨中国人的饮食思维,如“民以食为天”,则属于文化观念。

教材中文化内容的组织与呈现方式深刻影响文化内容的学习效果(郭宝仙 2020)。呈现路径指教材通过哪些板块来展现或承载不同文化的信息,主要包括文化语篇、文化背景信息、文化知识板块、活动/练习、图片等(张虹,李晓楠 2022a)。呈现视角则聚焦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呈现关系,根据中华文化是单独呈现还是与其他国家文化共同呈现,分为独现和共现两种类型。这种分类方式有助于深入理解教材中文化内容的编排逻辑和呈现特点。

2.4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内容分析法(王亚敏 2023),选取词汇、句子、段落、语篇及图片作为文化信息点的编码单位。当某一段落或文章包含多个文化信息点时,则对其进行分割处理。两位编码员通过逐词逐句的细致阅读,自下而上对教材中的

文化信息点进行初步编码。若编码员在信息点的提取与分析上存在分歧,则通过讨论达成共识;若仍无法统一意见,则邀请第3位研究者参与讨论并作出最终决定。

通过对教材的逐册分析,研究者对《新经典》中涉及的中华文化内容进行了全面梳理,共提取出219个一级文化信息点。对这些信息点进行归类和范畴化处理,明确其文化主题、呈现维度、呈现路径及呈现视角,由此形成67个二级文化主题编码和28个三级文化主题编码。最后,研究者对文化信息点的呈现维度、呈现路径及呈现视角进行频次与占比的统计分析。

3. 研究发现

下面围绕研究问题,分别从中华文化主题、呈现维度、呈现路径和呈现视角四个方面分析《新经典》的中华文化呈现。

3.1 中华文化主题

研究发现,教材呈现了多元、丰富的中华文化,共包含219个一级文化信息点。通过三级编码对文化主题进行分类统计(见表1)。在文化主题的选择上,教材既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勤勉刻苦的传统美德、社会交往的礼仪规范、底蕴深厚的汉字文化、流芳百世的文学经典等内容;同时也关注新中国发展成就的呈现,包括便捷的移动支付、多元的文化设施、进步的环保观念以及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等当代文化元素。

表1:《新经典》呈现的中华文化主题

文化主题	频次	百分比	文化主题	频次	百分比	文化主题	频次	百分比
文学	54	24.7%	国情	7	3.2%	休闲娱乐	4	1.8%
学习生活	14	6.4%	居住	7	3.2%	旅游	3	1.4%
城市	14	6.4%	环境保护	5	2.3%	大众文化	3	1.4%
语言文字	13	5.9%	服饰	4	1.8%	家庭生活	2	0.9%
社会交往	11	5.0%	体育运动	4	1.8%	经济	2	0.9%
节日风俗	11	5.0%	科技	4	1.8%	健康	2	0.9%
饮食	10	4.6%	文化遗产	4	1.8%	企业	1	0.5%
价值观	9	4.1%	制度规章	4	1.8%	交通运输	1	0.5%
人生庆典	9	4.1%	人物	4	1.8%			
跨文化交际	9	4.1%	地理	4	1.8%			

统计数据显示,在教材涉及的28个中华文化主题中,(古代)文学主题出现频次最高,共计54次,占比达24.7%。古代文学作为内容最为丰富的传统文化类目,不仅深刻而且生动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

精神,也是传统文化中最容易为现代人理解、接受的一种形态(张岱年,方克立 1994)。具体而言,教材选编的文学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其一,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德的故事,如“人心换人心”所蕴含的仁爱之

心,“养子方知父母恩”所彰显的孝悌之义;其二,名人励志故事,如“水滴石穿”“凿壁偷光”等;其三,蕴含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典故,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这些文学内容通过情景化和具体化的叙事方式,使抽象的价值观念具象化,有助于学生深入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研究还发现,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出现频次较高,如学生兼职、假期旅行、就业准备等。这类与学习者个体经验直接相关的文化主题,能够有效激发学习兴趣,降低文化理解难度,对于初级水平的韩国语学习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教材在文化呈现视角上突破了传统的静态国别模式,注重展现中韩文化的互联互通。跨文化交际主题共出现9次,占一级文化信息点总数的4.1%。教材采用互访式设计和双向视角进行编排:1—2册以韩国留学生在北京的学习生活为背景展开叙述,3—4册则转向中国留学生在韩国的见闻经历。这种编排方式充分考虑了中国学生先在国内学习,后赴韩国留学的实际情况。例如,通过呈现“在韩国的餐馆与朋友讨论韩国人喜爱的中华料理”“在中国观赏韩国音乐剧”等场景,展现了中韩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交融。这种设计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也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支撑。

3.2 呈现维度

基于 Moran(2004)的文化五维框架分析,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呈现以文化产品(121个,55.3%)和文化实践(88个,40.2%)为主,兼有文化人物(2个,0.9%)、文化观念(3个,1.4%)和文化社群(5个,2.3%)。这些内容具有生活化和典型化的特征,都是学生较为熟悉且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如川菜、四合院等衣食住文化,吃粽子、赛龙舟等节日习俗,大学生支教、参军入伍等社群文化。

在各类呈现维度中,文化产品占比最高。这一发现与张虹和李晓楠(2022a)的研究发现互为印证,即文化产品作为最易认知的文化物质形态,是文化教学最直接的内容载体,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文化实践方面,教材主要选取与学生个体经验密切相关的主题,如学生过度使用手机的社会现象、现代社会的快捷支付方式以及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习俗等。

文化社群的呈现主要围绕大学生群体展开。教材选取贴近学习者生活经验的话题,如学习生活、休闲娱乐、职业规划等,鼓励学生讲述身边的故事。文化人物方面,教材仅包含1篇关于历史人物的听力

语篇,这一维度在教材中的呈现相对薄弱。

3.3 呈现路径

首先,文化呈现的位置对教学功能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见表2),《新经典》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呈现主要集中于文化知识板块(47.9%),其中“小故事大智慧”板块占比最高,主要用于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文化观天下”板块则通过文化对比的形式,在介绍韩国文化的同时,引导学生讨论中国的相关情况。这类文化对比练习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还能促进其主动获取文化知识,并运用已掌握的韩国语能力阐述个人观点。文化知识板块的高占比可能源于其内容相对独立,便于在教材中设置专门的文化议题,同时在编写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表2:中华文化在《新经典》中的呈现路径和视角

呈现路径		频次	百分比
文化语篇		30(10)	13.7%
背景文化知识		10(3)	4.6%
图片/引言		8(8)	3.7%
文化知识板块	学文化观天下	48(0)	21.9%
	小故事大智慧	57(51)	26.0%
活动/练习	语言练习	11(10)	5.0%
	文化理解	10(5)	4.6%
	文化表达	45(13)	20.5%

注:“()”内数据代表中华文化独现的频次。

此外,中华文化在活动/练习中的呈现占比也较为显著(30.1%)。课后练习中设计了多个与单元主题相关的中国元素,其中文化表达类活动占比最高,这表明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叙事能力。以第2册第10单元的课后练习为例,要求学生介绍上海的垃圾分类措施。此外,文化理解类活动旨在引导学生探讨文化的深层含义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同时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文化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文化在第1册和第2册主要通过背景文化信息呈现。这些信息涉及城市或地区(如北京、上海、张家界)、著名地标(如王府井、西单购物中心)、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或艺术形式(如京剧),以及饮食文化(如湖南菜)等相关词汇。这些词汇未必承载过多的文化含义,但作为基础阶段的中华文化元素,已有效融入教材设计中。

3.4 呈现视角

研究发现,教材中华文化的呈现方式以共现为

主,仅有少数语篇和活动/练习专门以中华文化为主题。具体而言,教材通常在同一单元的主题框架下,通过不同语篇分别呈现中韩两国的文化。例如,第2册第14单元以“传统民俗”为主题,其中2篇课文分别探讨了中国和韩国的民俗文化;第4册第6单元围绕“善举”主题,通过2篇课文分别呈现了韩国的捐献文化和中国大学生参与西部支教的内容。对于语篇内部的文化共现,教材往往通过在介绍目的语文化的同时自然融入中华文化的策略,达到文化对比与融合的目的。以第4册第15单元的语篇为例,在介绍韩国的神话故事“仙女与樵夫”后,自然引出与之相似的中国神话故事“牛郎织女”,并深入分析指出“神话故事本质上蕴含着人类普遍的情感和价值观,但每个故事又结合了各自文化特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这种通过话题展开自然引入中华文化的方式,不仅实现了文化的有机融合,也激发了学生对文化深层内涵的思考。

从具体内容来看,文化共现策略更加强调文化共性,突出反映了中韩两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似性特征。同时,教材也注重呈现当代两国青年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与挑战,如高物价、就业压力以及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等。这种对文化共性的强调,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共通性,也为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奠定了共同的文化认知基础。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四层级分析框架对《新经典》中的中华文化呈现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发现,教材通过语篇、练习、图片以及文化知识板块,有意识地融入了丰富多元的中华文化主题。基于研究结果,从呈现维度、呈现路径和呈现视角等方面提出以下优化建议。

4.1 平衡文化要素,优化各维度比例

Moran(2004)认为文化的5个维度相互关联,最为核心的是文化观念,文化产品和文化实践背后是隐形的文化观念。《新经典》虽呈现了丰富的表层文化内容,但对深层文化观念的挖掘尚显不足。建议适当增加“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体现中华民族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的核心文化观念。通过系统化的语篇设计,使学习者在理解文化表象的同时,深入把握其背后的价值内涵,进而实现文化认知与价值观塑造的有机统一。

同时,建议强化文化社群与文化人物的呈现。一方面,可通过展现我国56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及语言保护实践,增强学习者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认知;另一方面,可适当增加历史名人及当

代杰出代表(如黄大年、屠呦呦等)的典型案列。研究表明,文化人物的个体叙事不仅能够生动反映社会历史背景,更能引发学习者的情感共鸣与认知内化(杨冬玲,汪东萍 2022),从而提升文化传播的有效性。

4.2 增强中华文化显性呈现,优化文化输入路径

《新经典》的中华文化呈现主要依托文化知识板块和活动/练习,显性呈现有待进一步加强。张虹和李晓楠(2022a)指出,在活动/练习中,学习者往往过度关注语言形式的准确性,而忽视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这种设计倾向可能源于编者的预设:中国学习者已具备一定的本土文化知识储备,因此更需强化文化输出能力以“讲好中国故事”。然而,吕丽盼和俞理明(2021)的研究表明,学习者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不足,其根源不仅在于外语表达的局限性,更在于对本土文化知识的系统性掌握不足。为此,建议增加以中华文化为主题的语篇,提升显性文化呈现比例。同时,在活动设计中强化语言支持,为输出类活动提供必要的关键词汇、常用表达和句型框架,降低文化输出的语言障碍,使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有机结合,实现互促互融。

4.3 强化跨文化视角,深化文化理解

跨文化教育强调在不同文化之间建立联系。因此,教材文化内容设计应充分考虑学习者的认知水平与语言能力,通过中外文化的互动呈现,引导学习者在文化比较中深化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以第4册第2单元为例,文章虽然生动展现了中国留学生在韩国语亲属称谓使用中的典型问题,但仅限于对韩国语的讨论,未能联系汉语的特点展开文化对比和进一步探讨两种语言差异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建议在类似主题中融入文化对比视角,帮助学习者识别中外文化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孙有中 2016)。这种跨文化视角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目的语文化的理解,消解学习者感受到的文化冲突,更能促进学习者对本土文化的再认识,从而实现文化认知的双向提升,因而教材文化编写需要对中外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的差异熟稔于心(于小植 2023)。

5. 结语

本研究以《新经典》为例,通过构建包含文化主题、呈现维度、呈现路径与呈现视角的多维度分析框架,探讨了韩国语教材的中华文化呈现特征,并提出了“文化要素平衡—显性路径优化—跨文化视角融入”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新时代表语教材的编写和修订提供有益参考。同时,本研究希望启发

教材使用者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挖掘现有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元素,从而更有效地培养兼具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新时代外语人才。由于本研究仅以单套教材为研究对象,结果的普适性和推广性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研究可拓展至多套教材的系统对比,或从教师、学习者双重视角探讨文化呈现的教学实现路径。这些研究将为优化外语教材的文化融合功能提供更为坚实的实证依据,助力提升新时代外语教育的文化育人功能。

参考文献:

- 迟若冰,刘俐,张婷婷. 2024. 西方跨文化交际教材中的中华文化呈现研究[C]//查明建. 外语教材研究(第三辑).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80-96.
- 从丛. 2000. “中国文化失语症”: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 光明日报. 2000-10-19.
- 葛囡囡. 2022. 中国德语教材文化呈现研究——以《当代大学德语》为例[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4):62-68.
- 郭宝仙. 2020. 新时代英语教材的文化使命及其实现路径[J]. 课程·教材·教法(9):102-107.
- 贺莉娜,任承炫. 2022. 韩国中文教学资源发展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1):82-92.
- 李海英. 2021. 韩国语高级教材分析研究——以文本为例[J]. 中国朝鲜语(5):39-50.
- 李加军. 2023. 大学通用英语教材的(跨)文化呈现研究[J]. 外语界(1):66-75.
- 林晓华,林睿. 2024. 美国“Z世代”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符号认知与传播的调查分析——以尤宁山大学为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6):73-80.
- 卢星华. 2017. 韩国语听力教材研究——基于韩国语准口语语料库中的代词计量特征分析[J]. 东疆学刊(3):62-67.
- 吕丽盼,俞理明. 2021. 双向文化教学——论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J]. 中国外语(4):62-67.
- 苏莹莹,董希骁. 2021. 我国高校非通用语种专业教材建设的问题与对策[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4):77-83.
- 孙丽萍,苏晓霞. 2020.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韩国语教材文化因素评析:以《延世韩国语》(中级)为例[J]. 语言与文化研究(1):53-58.
- 孙有中. 2016. 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J]. 中国外语(3):17-22.
- 谈佳,张璐. 2022. 《法语》(修订本)的文化呈现研究[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4):53-60.
- 王亚敏. 2023. 中国概况教材中人物选取与形象建构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6):43-51.
- 肖维青. 2024. 新时代大学英语教材“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与实践[J]. 外语研究(4):55-59.
- 杨冬玲,汪东萍. 2022. 外语教材思政建设研究:文化分析内容、方法与理论视角[J]. 外语电化教学(3):16-22.
- 于美灵. 2022. 韩国语教材中的课程思政元素探究——以《新经典韩国语精读教程》1、2为例[J]. 东北亚外语研究(3):38-49.
- 于小植. 2023. 对外文化教材编写中可资借鉴的中西方理论资源[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4):54-61.
- 张岱年,方克立. 1994.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虹,常文哲,苏晓俐. 2024. 中德英语教材文化呈现比较研究[J]. 外语研究(2):72-79.
- 张虹,李晓楠. 2022a. 英语教材文化呈现分析框架研制[J]. 中国外语(2):78-84.
- 张虹,李晓楠. 2022b. 高中英语教材文化呈现研究[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4):42-52.
- 张虹,于睿. 2020. 大学英语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研究[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3):42-48.
- 张军,刘艳红. 2022. 教材语篇的文化内涵——一项基于语料库的《大学思辨英语教程》研究[J]. 中国外语(1):90-97.
- Apple, M. W. & L. K. Christian-Smith. 1991. *The Politics of the Textbooks* [M]. London: Routledge.
- Cortazzi, M. & L. Jin. 1999. Cultural mirro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he EFL classroom [C]//E. Hinkel. *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19.
- Gray, J. 2010.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Culture, Consumerism and Promotion in the ELT Global Coursebook* [M]. Basingstoke: Palgrave.
- Jang, M. J. 2017.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items on the college Korean textbooks for foreign undergraduates [J]. *The Journal of Korean Ethnology* 69(1): 20-40.
- Kang, H. H. 2011. A study on the Korean language dissemination culture program [J]. *Korean Language Education* 65(1): 1-25.
- Moran, P. R. 2004. *Teaching Culture: Perspectives in Practic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Risager, K. & C. A. Chapelle. 2013.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C. A. Chapelle. *The Handbook of Techn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46-260.
- Ryu, H. J. 2017. An analysis on the Korean 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 Korean textbooks for academic purpose [J].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65(1):281-314.

收稿日期:2025-02-14

作者简介:刘静,博士,讲师。研究方向:韩国语教学与教材研究。
(责任编辑:付满)